

西蜀文史資料

第四輯

本 辑 编 委 会

主 任: 孙禄石
副 主 任: 王悦锋 姜同全
委 员: 李春莲 李长军
执行主编: 王传珍

西岗文史资料

第四辑

*

旅顺包装装潢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 印张 125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辽连出临图字(1997)第 71 号

西岗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大连市西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7年7月

2A6/04

目 录

序言	政协大连市西岗区委员会主席 李雨林(4)
田风在我心中	汪 惟(6)
从西岗商人到出任大连市长——徐宪斋浮沉记	黄本仁(18)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西岗的民族工商业	袁宝莲(25)
小岗子市场	王 枫(40)
解放前西岗的名菜馆及名菜	蔡 毅(44)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西岗宏济善堂真相	王伯润(51)
北岗子反奸清算斗争	西岗党史办(66)
西岗区“穷人大搬家”	西岗党史办(71)
大连佛教史	黄本仁、迟学元(76)
五十年代初的西岗小学教育	刘英琦(93)

目 录

大连渔轮公司概况	大连渔轮公司(100)
日伪时期统治西岗地区的警特机构 ...	王建华(113)
西岗民族服装业发展史话	刘 韧(121)
纪念苏军解放大连 52 周年	祝 丽(130)
1952 年的“五反运动”	陈 军(141)
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合作化	步 玉(157)
旧社会“三不管”的香炉礁	安 晶(175)
石道街史话	赵新华(179)
西岗大菜市的今昔	黄庆秋(182)
建国前后旅大地区私营电线制造业的发展变化	
.....	于永波(185)
新开路的变化	田 莺(195)
西岗和全市路街名称的演变	马丽晶(199)

序 言

李雨林

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九年提出并倡导的，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邓颖超主席也曾明确提出：“我觉得政协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是属于这一类”。“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西岗区政协自恢复建会至今四届工作以来，对文史工作始终抓得很紧，征集了大量史料，并连续出版了三辑《西岗文史资料》。

今年是四届委员会的最后一年，也是隆重庆祝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党的十五大召开的重要一年。我们在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存真求实的原则，积极开展文史资料的抢救、挖掘、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又编辑出版了第四辑《西岗文史资料》。它为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乡土教材，也是我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

本辑的内容,本着拾遗补缺的精神,既注意体现资料的翔实,又注意多样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讹和遗漏,恳请读者诸君予以指正。

在本辑的编辑过程中,承蒙老前辈、各界老朋友和有关同志的鼎力支持,使之及时顺利出版,我谨代表西岗区政协向关心和支持区政协文史工作的各级领导和朋友,向为此长期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朋友们表示谢意。同时,我们殷切希望熟悉西岗情况的前辈和各界人士,踊跃为我们提供史料或撰写稿件,遵照周总理生前教导“把自己掌握的这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这一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使命,为开创西岗区文史工作的新局面作出我们新的贡献。

一九九七年六月

田风在我心中

汪 惟

献身事业的精神

人生如白驹过隙，眨眼间 41 年倏然而去。那逝去的人和事如叠印胶片，已放不出清晰完整的形象，大都无法追索了。但，那一天，1948 年 6 月 4 日，在关东社会教育工作团（旅大文工团）东院圆顶大庙的二楼上，一位艺术家形象却很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他留着大背头，长鬓角，宽阔的上额，尖尖的嘴巴，黑黑的络腮胡茬儿；隆起的颧骨下，脸腮变成两个深坑，深陷的眼窝里藏着一双张飞式的凤眼，白眼球有些泛黄，露出几许病态的疲倦和憔悴。巧，在我谈过 1947 年黄菊吐芳时节在哈尔滨穿上民主联军黄棉袄的过程之后，他又进一步问我的身世，一开口我便听出来了，他也是沈阳人；更巧的是，我一说到在省立二中读的初中，他便立即插话：“……在大十字街，那是个很好的学校，也是我的母校啊”！即同乡又同校，想必他

会满足我对专业工作的请求吧，但，我想错了。他说我才十八岁，太年青，缺乏生活阅历，暂时不宜搞文学创作，让我首先建立革命的事业观……他是我的命运之神，后来终于为我安排了比较恰当而如愿的生活位置——可供献身的事业。

他，就是当时社教团的副团长田风同志。这一年他 36 岁。

来团不久便知道，田风同志的家就在大庙西北角那座日本式的木屋里，和我住的集体宿舍有走廊相通。但，他似乎喜欢深居简出吧，为什么总见不到呢？有人告诉我他病了；那天他是带着病接待我的。怎么病的？工作累的。

被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海陆四面包围封锁的旅大地区，粮食极端匮乏，到 1948 年春，人民已经在饥饿线上挣扎 3 个年头了。当时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以度过饥荒。社教团为配合这一运动，赶排了大型歌剧《李桂英》，在城乡进行了巡回演出，反响强烈，轰动一时。这出戏是田风同志从秧歌剧《王秀鸾》移植、改写而成。由于原剧是从冀中解放区展转万里随身带来的残缺不全的本子，多半靠回忆和重新构思创造，来改写，来赶排，往往是白天赶排戏，夜里赶写剧本，日以继夜积劳成疾，竟患了肺结核，口吐鲜血。他带病坚持把戏奉献给广大观众。他常说：要有对革命献身的精神；要刻苦学习，钻研业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和鼓励他人这样做。文工团专业化后，乐队和第一把小号手李明同志常爱在后院的大钟下练功，早晨天不亮，晚上人们上床前，他都要练一阵子。后来有人对他说了什么，他不再在大钟下练功了。有一天田风同志遇见他，问道：你闹什么情绪，咋不练功了？他说怕影响团长睡眠。田风同志说：我听不到你练功才睡不好呢！

我刚到社教团，安排我在音乐队工作，在音乐家王石路同志的帮助下，学声乐，学双簧管，很努力，但我深知自己受种种基本条件限制，很难取得成就而始终不忘学习自小喜爱的绘画和文学。1948年深秋，与清旻同志一起创作并由我演出的鼓词，取得了较好的演出效果，又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田风同志注意到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当搞专业化分工时，我被他宣布为9人组成的专业文学戏剧创作组的成员。可以说，是田风同志确定了我终生从事的专业，也是田风同志献身事业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使我在文学事业上历尽艰辛和苦难而不悔。

火热心肠和火爆脾气

1949年底，旅大文工团在沈阳参加了东北文代会。会议结束后即将返回大连的前夜，我和王建民等几个青年团员接受了一项临时任务，立即奔赴沈阳南站的货车站台看守货车和堆积在站台上的物资。物资中有演出用的布景道具，有很贵重的服装，还有为改善集体伙食在沈阳购买的大米和黄烟。

这天晚上北风呼啸，风里夹着雪粒儿，扑到脸上如针扎一般，气温已降到摄氏零下25度左右。我穿一套新发的棉中山装，贴身衬着一套日本军用毛线衣裤，刚来到站台上就被凛冽的寒风打透了。我们进车厢里把演出用的俄国式老羊皮军大衣裹在外面，又穿上演剧用的大皮靴，这也很难挡住风寒。我和王建民同志把一位患了感冒的同志蒙在苫物资的大棚布里，而我们自己却继续在站台上跺着脚，死死地盯着看守的物

资，一会儿也不敢离开，好像离开几步，东西就会被什么人抢跑了似的。其实，站台上除昏昏的灯光和闪亮的雪粒儿，什么也看不见，夜深后连风声也没有，可以说如死一般的寂静。这时冷的感觉更强烈了，我觉得冷气通过皮肉钻进了五脏六腑——凉透了！我紧闭双唇，咬紧牙关，还是抑制不住牙帮颤得嘎嘎响。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忽然，远处传来脚步声，我的心随着“踏踏踏”的脚步声的逼近越绷越紧，如何应付？一闭念想起东厢里有演剧用的军刀……我刚一回头，那人在灯光下出现了。啊！原来是舞台工作队队长。他来到后，立刻领我们爬进闷罐子车厢，利用演剧用的地毯及床上用品和衣物建造一个挡些风流儿的小窝窝。当我们都斜坐下来时，他从背包里拿出一瓶高粱烧，又把一纸包切碎的熏肉摊在我们中间。我们轮流着对瓶口灌酒，灌一口酒吃一口熏肉。虽然酒如麻辣的冰水，肉更带着白花花冰碴儿，可不多会儿，浑身痒酥酥地发起烧来。我们问队长，怎么想来看我们？他说是田团长给他钱，让他买东西给我们送来的。啊！田风同志在忙乱中并没忘记我们，我心里一热，眼圈儿也湿润了。

田风同志爱同志的事，一时很难说尽。不过他有时也发脾气骂人，而且骂得很凶。

那是1949年五·一节前夕，在群众剧场（西岗区文化馆剧场）《保尔·柯察金》总排中发生的事。总排是彩排性质的，即把多日在排演场分段分场的排练，搬上舞台组合起来，大家按公开演出的要求，把音乐、服装、化妆、布景、道具、音响效果、灯光等综合艺术的所有艺术手段全部组装在一起，以调整统一总的艺术效果。这次总排中间，在灯光这一关键环节上不停地出问题：不是人不在岗，就是缺这少那，再就是不按导演

规定行事……整个总排一再因灯光不对而中断，这样耽误下去无疑会影响次日的预演。人们都知道赶排这出戏是为迎接“五·一”节旅大党公开的佳期。同志们都对灯光组的同志有意见。到了午夜，田风同志终于失去了耐性火冒三丈，破口大骂灯光组负责人王某。王某以前就常挨批评，以后也常挨批评，不过没听说有什么违法的事。可是，田风离开文工团不久，王某便开始犯罪，一再触犯刑律，进了牢房，终于成了文艺界的败类。

还有一次，是文工团在人民文化俱乐部招待外宾演出中发生的事。那一天天很热，剧场更闷，演员汗流浹背，剧场竟不准备饮用水，演员忍无可忍便去催要。剧场的人竟说：渴，到厕所去喝。田风同志听到了这侮辱演员的恶语非常气愤，立即批评了剧场的负责人。可是那负责人不仅不接受批评，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田风同志发了脾气，骂了他，而且声明：演出如发生问题要他负完全责任。直逼得那位交际处的官员放下架子服了软，指使人给演员送来了饮用水，道了歉，才算了事。

我那时年轻，自尊心特强，很怕承受不住田风发脾气。在《保尔·柯察金》剧中，他派我演薛尔基，可是在排练中，我的表演一开始就叫他为难，甚至是难堪。大幕拉开，我第一个叫喊着跑上台。这叫喊是我的难题，我的嗓音特低，根本叫不出童声，成了我的心理障碍；而且我的神经反映特别迟顿，又是我表演上的致命缺憾。这段上场戏只跟在场的保尔有两句对话，做两个孩子动作。这么简单的戏，导演反复排，我反复做就是做不好。有人给我数过，竟排了60多次，最后也没能让导演满意，这事一时成了团里的趣闻。当时，我很怕田风骂我，可是他没有，连发一次脾气，说句难听的话也没有。这个戏演了大

半年后，我做为道具组的负责人，在往市公安局送枪械道具时，发现放在后院大庙地下室里的十几发七星手枪子弹不见了。我反复找，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子弹不是一般物资，怎么交代呢？我非常害怕，流着泪向田风同志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检讨了自己的拖拉作风和缺乏应有的责任心。我万万没想到，田风同志一点也没发怒，只是皱了下眉头，然后平静地说，以后注意就是，给公安局打个报告吧。事情就这样简单地过去了。

过去了几十年，我追索往事，对田风同志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他确实吵骂过一些人，但他更爱护、保护了一大批人。有些人即使才能不高，只要勤恳工作，忠于职守，一时失于检点做了错事，他也不过份深责，有时还不厌其烦找同志交谈思想，直至打通思想。写到这里我记起1951年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我年青好胜，急于成就事业，而不知体谅领导人的苦衷，在如何对待深入生活与配合政治任务的矛盾问题上，我与田风同志发生了分歧，我还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但，后来田风同志并未因此而改变对我的态度，更谈不上乘机报复了。这是怎样的胸怀啊！

坦荡乐观荣辱无惊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印在我脑里的田风同志面孔，有时严肃，有时严峻，也有时愤怒；更多的时候是和蔼可亲，坦诚的喜悦，放声的笑；更有时作出滑稽的丑相，那是在启发演员锻炼脸上的功夫。有一次，在团内的晚会上，他扮演了京剧

《鸿鸾禧》中的花子头，也作出了那种善良可笑的面孔，一出场就把人们笑弯了腰。但，我从未见过田风同志愁眉苦脸。他自己在十分繁杂的工作中总是保持乐观情绪，似乎也希望在他领导下的所有团员都能发奋工作，愉快生活。他很能理解年青人的心态，谈话富有鼓动力，在每次新任务开始之前，他的动员报告都能把每个人的心鼓动得跳出来，激动得流泪，然后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全付精力投入工作，直到完成了工作任务也不觉得疲劳。有时，工作还在进行中，他已经为假日休息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1948年秋天，我萌发了思乡之情，那时我与家乡父母断绝音信已经一年多了。我每天关注着报纸、电台的战争新闻，连作梦都梦见沈阳解放。当我终于盼来了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辽沈战役结束的这一天，立即给家里写了信。可是过了一个多月才得到消息，知道我的家已搬进关内，我离家反倒更远了。恰这时，团里布置了新年春节的演出任务，在田风同志工作动员报告的鼓励下，我几乎忘记了想家的心思。可是工作一有间歇，思乡之情又悄悄地向我袭来，又苦闷得难以忍受。不过那时的文工团绝大部分人都住宿，像个大家庭。不几天，团内过节的气氛又把我的神魂捉住了。全体同志停止一切工作，全部投入布置节日环境、准备节日生活的事情之中。大庙里前后院高悬了许多彩灯，照得庙宇楼阁五彩缤纷，如同仙境，屋内所有角落收拾得干干净净，走廊、墙壁上都装饰了美术画图。节日一到，开展各种游艺活动，舞会通宵达旦。田风同志和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尽情尽兴地玩个痛快……开国前后那几年，每个周末都有晚会。晚会中除跳舞外，有时常演出古今中外著名的戏剧、音乐和舞蹈。有时也演出团员们自己精

心创作的节目,其中,有的搬上了对外正式演出的舞台。那时的文工团,紧张的工作同尽兴的娱乐结合得非常好,可以说演出时是战斗的集体,休息时是自由的乐园。

五十年代初,田风同志提出了一整套全面改革文艺工作的计划,想把这个很有基础的艺术团体推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计划得到了旅大区党委的批准和支持。谁也没想到,改革工作刚刚迈开第一步,新机构按新计划运行不足两年,便被一场政治运动给冲垮了。田风同志呕心沥血惨淡经营起来的事业毁于一旦。田风同志不仅无功无赏,反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即使在蒙受不白之冤的当时,也没见他愁眉苦脸。

1952年春夏之交,市文联编辑部和文艺部宿舍所占用的松山街山上28号楼院,由市里调给公安局使用了。我和创作组的王同禹同志(已故作家)搬到画家朱鸣岗家楼下住(朱后来任鲁美教授,现已退居故乡福建养老)。楼上三室一厅,我和同禹为享用充分的阳光,各占用了一间小房间,中间的大房间空着,很是空荡。没想到,不久的一天,田风同志搬来住了。那时,他的腰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正在发作。他有家室,住的是大公街头的一座不错的小楼,却单身出来住。他正在等待着党纪政纪处分,按常人,那苦辣辛酸的滋味是不可想象的。但他泰然自若,似乎在他身上没发生过什么事。有时他讲到自己的病痛情况,讲到他在马栏村请一位针灸师治疗的情况,说那里进行的是竹管灸,把身上痛处的皮肤用刀割几个小口,再用经水煮过的竹管灸上,拿下竹管时灸出一些乌血。他多是忍着痛对我们说,说到竹管灸的效果,他竟有些高兴:“有作用,痛得轻了”。他从没让我们为他感到痛苦。对于在运动中那些过激的言词和似是而非的揭发材料,他自己从未流露过一星半点

的怨愤情绪，不说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像没那回事一样。

忘我地关心人和事业

那时三反运动到了后期，文联和它所属的文工团正处在紧缩机构精减人员阶段。田风同志最关心的是一些同志的去向。每听到某位有才华的同志走掉他便不由得“唉——”一声；对砍掉大乐队尤其使他痛心（那是在全国最早建立、最早进行正规训练的管弦乐队），脸上出现严峻而又无可奈何的表情。这期间，他对我的走向也十分关心，态度很明朗地说出了他的看法。后来事情定下来了，他还为我的前途着想……

这得回过头来从1952年初的春节除夕之夜说起。

60多人的文联机关，经过精减只留下6个人。来到除夕之夜，六个人也大都各奔他乡了。我本来也想回天津父母身边过年，临时留下管事的王石路同志代表组织委任我在假日里照看一下机关大楼，我才没走成。那时我住在文联机关大楼旁边，白玉街的一座小楼上，与作家钱醉竹老人一墙之隔。晚饭后他不知到哪里去了，我感到凄凉和孤独。恰这时，王同禹同志不知怎么从女朋友那里回来了，说要同我一起去看望田风同志。我欣然乐从，立即徒步奔向大公街。田风同志在书房里，见到我们非常高兴，立即拿出酒来，摆上了简单的菜肴……我们边谈边喝，酒兴上来南朝北国无边无沿，忘乎所以，不知不觉到了深夜，竟把田风同志的酒喝光了，但仍未尽兴。我跑到鲁迅公园（既原动物园）对过的小商店，敲开夜间窗口买了几瓶啤酒。那一夜谈了很多人和事，大都是交心之谈。当田风谈

到他在日本东京的生活，谈到他苦练油画的情景之后，我的视线一下触到对面墙上的油画，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问题：“这画怎么不太像你呀？”这并非出于对田风绘画技艺的怀疑，倒是他的技艺让我震惊，引起我的崇拜。记得他导演《小突击队》时，我负责道具，剧中布景墙上需挂上一幅毛主席画像，他答应由他来画，直到彩排的前一天他才抽出空儿来。按他的吩咐，我买来了一斤烧酒、一个馒头、一包黄香和一个喷雾器。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知道是应该给准备一个打格放大用的木尺，便自做主张地弄了个递给他。他不接，瞧了我一眼笑了：“打格？我的美术不是白学了！”我半信半疑，在一旁紧盯着他的炭笔……不多一会儿，一张炭笔画领袖像勾勒出来了。我特意仔细把画与他手中的照片对比，几乎找不出什么差异。我说：“像极了！”他却说：“不行，差远了！”接着他开始仔细修改。从这我才发现，他要准备的东西逐渐派上用场了。他掰开馒头，用来擦掉他认为画得不满意的地方。他擦了画，画了擦，修改的时间倒比最初勾轮廓的时间长了好几倍。最后他喝了几口酒，吃掉剩下的那一半馒头，剩下的半瓶酒放进了黄香，待黄香溶化后装进喷雾器，把画用黄香溶液喷洒一层。他说这样炭粉就不会脱落了。这时再看那画，觉得比原件照片更具真切感，更有神彩。可是，田风同志自画像为什么有些走形呢？“也许画的是十几年前在东京时的风貌吧？”他摇了摇头说：“也是也不是，可以说是超时空的我。艺术主要追求的不是形似，贵在神似；真正的艺术不在摹写生活，在于表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进而他讲了表现派、象征派、印象派……等艺术流派，也讲了达·芬奇、米勒、塞尚等伟大画家的作品。可惜那时我知道得太少了。经他一番启迪，我似乎半明半暗地领